

# 「張南通（謇）日記」

張朋園

張謇五十三年的日記，最近分別由臺北文海出版社及香港遠東圖書公司印行。文海印的是前半部，遠東印的是後半部。原來，張氏日記的前半部早已由張韶武氏（張謇姪孫），攜至香港，後半部保存於大陸。七年前張謇的後人將後半部公諸於世。去年春天，前香港新亞書院圖書館館長沈燕謀氏徵得原藏者的同意，亦將前半部交由文海印出。後半部因為大陸以外地區不易獲得，遠東圖書公司又將之重行影印，由龍門書局合而為一發售。這樣，歷史學界總算在今天看到了張謇日記的全貌。

張謇日記起始於清同治十二年癸酉九月四日（一八七三、一〇、二四），絕筆於民國十五年丙寅陰曆六月二十四日（一九二六、八、二），差兩個月又二十二天，便是整整的五十三年。張謇開始寫日記的那天，正好年滿二十歲零二十三天。（張氏生於清咸豐三年癸丑五月二十五日——一八五三、七、一）絕筆之後二十二日去世。（張氏逝於民國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）。

這部日記，除了小有殘缺，大體上是完整的。殘缺情形如下：

光緒六年庚辰六月一日（一八八〇、七、七）至同年十二月三十日（一八八一、一、二九）。

光緒七年辛巳全年（一八八一、一、三〇——一八八二、二、二七）。

光緒八年壬午元月一日（一八八二、二、一八）至五月二十九日（一八八二、七、十四）；同年九月三日（一八八二、一〇、一四）至十二月三十日（一八八三、二、七）。

光緒九年癸未元月一日（一八八三、二、八）至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（一八八三、一二、二三）。

「張南通（謇）日記」

三六三

光緒二十年甲午十月一日（一八九四、一〇、二九）至同年十二月三十日（一八九五、一、二五）。

殘缺的原因，除光緒二十年最後三月者因張謇丁父憂，記明無日記外，光緒六年至九年的殘缺，顯然是散佚之故，（聞散佚部份流落在香港。）

個人的日記，大體應包括家庭生活及社會生活兩方面。家庭生活至少應有讀書修養及父母兄弟子女之間的親情記事。社會關係，至少應有交友、事業、時局大事等項目的記載。日記之最重要部份，應是個人對社會的認識與思想。讀過張謇日記所得的印象，若干方面還能滿足讀者的要求，若干方面則不能。張謇的家庭生活，因受傳統的影響，固守着倫理的觀念，對父母的孝順，子女的關切，隨時都有記載。張謇事父母極孝順，問安起居，日記中多有親情之流露。張謇雖然有妻妾四五，但入中年以後始獲一子。日記中對其子張孝若有十分關切的記載，每於歲首，均同時記下兒子和自己的年齡。他對於孝若的希望至為殷切，幼時延請教師在家發蒙讀書，稍長送入最佳學校攻讀，最後遣送留美。然孝若的興趣似未能如張謇所期望，每有拂意之處，在日記中輒有感喟。張謇在日記中的手足關係，除三哥張晉之外，其他兄弟的情形甚少提及。日記中的點點滴滴，可以看出他與張晉的悌情深篤。他時時為張晉的奔波而感嘆。當他的大生紗廠有了頭緒之後，即勸促張晉放棄五斗米的生涯，回鄉與之共同經營紗廠。張謇是張謇的好幫手，兄弟之間的感情十分篤厚。

張謇的個人修養及讀書生活，在日記中有詳細的記載。讀書寫字往往是每天生活的兩大課題。他的書法不讓前人，日記中常常提到應人求字及書寫摺扇等文人雅事。中年以後，更不時以鬻字所得貼補他的慈善事業。張謇對固有典籍有廣泛的涉獵，是一個標準的儒家紳士。由於固有典籍對他有十分的吸引力，似乎不曾對西洋文化多所接觸，在日記中鮮有關於西籍閱讀的記載。在新舊轉變的時代，他的中西之學是不平衡的。這頗影響他中年以後的事業

之所以成就有限，蓋張謇所從事者，都與所謂的中國現代化有關，非有新的知識，不足以應付其複雜的實業系統。日記中所提到的社會活動與社會關係，若干方面有相當的記載。譬如他參加科舉考試，接觸方面之廣，遭遇之崎嶇，種種記述，讓我們看清了強弩之末的科舉制度之不足以有為。同時又使我們景仰他的不屈不撓的精神。（沈雲龍先生對張謇日記前半部有詳細之介紹，關於張謇的科舉生涯，請詳沈著「張季直及其柳西草堂日記」。）

在他奮鬥個人功名的過程中，張謇結識了不少朋友。這些朋友，若干在官場，若干在鄉里。他們對張謇的事業有密切的關係。諸如湯壽潛、鄭孝胥、沈增植、許鼎霖、趙鳳昌等人，在日記中時有提到。地方官如張之洞、劉坤一、程德全等人，日記中透露張謇與他們有密切的往還。

張謇日記雖然有上述種種長處，但對一個歷史學者而言，却難於滿足其搜求資料的欲望。以張謇在當時的重要社會地位，日記中應該透露一些時局的內幕。中年以後的張謇，歷經甲午之戰、八國聯軍之役、立憲運動、辛亥革命、袁世凱稱帝、五四運動、軍閥混戰等等大事，但是張謇對這些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，在日記中大多輕描淡寫。對時局的發展甚少記載，對於時人鮮有批評。偶然有所記載或批評，亦僅本着言簡意賅的原則，含蓄帶過，難以據以分析時事時人。日記中透露，每當國家有大事發生時，張謇與上層人士有頻仍的往還。今日函某，明日謁某；今日某有關人士來訪，明日遣某答拜。但是謁談什麼，函札所敍何事，十九不提；必須與他的九錄文集相對照，才可略窺端倪。但九錄所收有限，信函大部不在其中。（張氏若干信函現存北京圖書館，及南通博物苑，均為重要之史料。）如果我們想利用張謇日記來了解清末民初的政局，是會感到失望的。

更有進者，我們也不能據這部日記去了解張謇的事業。張謇為什麼不從政？為什麼要興辦實業？這個一而二，

二而一的問題，不能從日記中得到解答。張謇在他的文集中謂：「馬關約成，國勢日蹙，私憂竊歎，以爲政府不責，非人民有知識，必不足以自強。知識之本，基於教育。然非先興實業，則教育無所資以措手。故自營心計，從通海最優勝之棉產始，從事紗廠。」（張季子九錄，實業錄卷四，頁三十）在他的自訂年譜中謂其母臨終遺訓：「汝性剛直，慎勿爲官。」（齋翁自訂年譜光緒五年己卯十一月）透露了他不做官而從事實業的原因。但在日記中却絲毫找不到這種關鍵性的記述。比較之下，日記的史料價值，似不如九錄及年譜。

何以張謇日記會如此之令人失望？這有兩大原因：第一，當是受了傳統士人言簡意賅的影響。張謇自二十一歲開始記日記，便有含蓄的筆法。但因爲他年輕憨直，有事必記，有感必錄，所以狎邪之遊一類浪漫行爲也不隱諱。

但當他年事稍長，落筆便有了斟酌。張謇的個性是開放的。他曾經數度將日記出示友好。讀過他的日記的人，曾勸促他改變寫日記的方式，這在日記中嘗有提及。但他們所建議的方式是什麼，却無進一步之透露，猜想就是言簡意賅一類的傳統筆法。從日記份量的逐漸減少，用字的日益含蓄隱諱，證明他的朋友都主張他少寫爲妙。在北京會考時，沈增植等人又曾勸他少對時局發牢騷，這對張謇的日記方式可能很有影響。五十餘年的日記，對時事的批評最少。愈到後期，愈難發現涉及時局的記述。張謇到了晚年亦承認他的日記多有不盡意之處，所以在自訂年譜中直言日記多「缺失」之處。

張謇日記過於簡單的第二個原因，當是他個人事業開展之後過於忙碌的影響。從筆跡上看來，往往十天半月始有一次補記，且若干僅得日脚而無記事。比較這五十三年的日記，早年者詳細，中年以後份量則逐漸減少。五十歲以後的記載，往往每月僅得二三頁，空白日脚愈來愈多。據粗略估計，張謇日記共得二十八冊，除第九冊散佚不計外，約得三四六〇頁。每頁約以二五〇字計，總共約得八十七萬五千字，每年平均不過一萬六千字，每日平均不過四

五十字。這樣有限的字數，篩去無關宏旨者，當然不會有許多後人所期望的記事。當我們沒有讀到這部日記之前，滿心以為一定可以藉之幫助我們解決當時的一些疑難問題。而結果竟是希望愈大，失望愈大。研究張謇的基本材料，截至目前為止，依然是他的九錄文集，自訂年譜，通州興辦實業之歷史，及一些有關的材料與著作。